

## 日子美了颜值高了：欢喜庄的欢喜事

新华社天津电(记者刘元旭、邵香云、黄江林)三伏时节，“北国水乡”欢喜庄，醒得格外早。

天刚放亮，村里新建的健身广场上三五村民正在晨练，自来水、污水管网提升改造工地上也出现了忙碌的身影。

六点不到，陈志明匆匆出了家门。一路上，白墙灰瓦的“徽派民居”错落有致，路旁绿树成荫，塘里荷花正艳，田里稻海荡漾，木屋栈道、亭台水榭点缀其中，在氤氲的晨雾中更具诗意。

顾不上欣赏清晨村里的好风景，陈志明直奔稻田。“趁凉快，多干点。”一到稻田，他先蹲身拉起沉甸甸的一网，又伸手揽过绿油油的一把，咧嘴乐了：“螃蟹、稻苗长得都不错，到秋天准能卖上好价钱。”

以生态种养为引领、精深加工为提升、休闲观光为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欢喜庄越来越“欢喜”。“土地流转费，年底分红，再加上合作社工资，我一年就有六七万元，家里添了两辆车。”陈志明边忙活，边和记者聊起来，一脸满足。

倒回去七八年，这里的光景远不如村名那般“欢喜”。地处天津市宝坻区八门城镇的欢喜庄，过去家家户户只种水稻，收入少，日子过得并不

富裕。如何把“地里刨食”变成“土里掘金”？当地干部一直很费脑筋，“一家一户，小打小闹，肯定不行！必须走规模化、集约化、品牌化的路子！”

说干就干！不甘落后的村民带头成立合作社，尝试稻蟹立体种养。“稻田养蟹还不把秧苗祸害光了吗？”“养蟹投入大，赔了咋办？”一开始，大多数村民都对这种模式起了疑，结果第一年，响应者寥寥，但令村民没想到的是，试验田当年就实现了“开门红”，平均亩效益达2000多元。合作社召开分红大会，几乎全村村民都去围观，一看一沓现金就在桌上摆着，当场分钱。回忆起当时的场景，陈志明至今仍觉得眼热，“眼看能挣钱，村民们开始纷纷加入。”

2013年开始，合作社流转了村里全部土地，其中1700多亩地实现了稻蟹立体种养，还建起了现代化稻米加工厂，并陆续开展了品牌注册、包装设计、有机认证、新品种引进等“供给侧改革”，产品卖到了高铁和飞机上。

一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了——缺乏技术，增收遇瓶颈。如何为增产增收寻找新出路？2017年，机遇到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天津启动新一轮结对

帮扶困难村工作，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的帮扶组进驻欢喜庄，给村里带来了更多惊喜。

“我们从延长产业链入手，帮着欢喜庄成功养殖了大眼幼体和扣蟹，蟹苗本土化后，预计一亩地螃蟹的收入能增长20%至30%，还引进了南美白对虾等特色高效水产品。”驻村后，帮扶组组长谭开良几乎每天都要到稻田转转。

然而，种养也有种养的烦恼，产业单一、抗风险能力弱，“看天吃饭”不容易。“家有钱财万贯，带毛的不算。”村民们都有担忧。

多元发展，势在必行。“我们不仅要做精产品，更要做强产业，以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为中心，深耕农产品精深加工和休闲观光农业及乡村旅游，推动以农业为基础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努力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目标。”宝坻区八门城镇党委书记李学明又为欢喜庄琢磨出新的发展路子。如今，以欢喜庄为中心的八门城镇田园综合体已初具规模。2019年，欢喜庄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8万元，其中，合作社人均分红8000元和200斤大米。2020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达到2.9万元，比2016年增加近万元。“乡亲们从靠天吃饭的农民，转型成了‘股东’和拿

工资的‘产业工人’，日子越过越美。”欢喜庄党支部书记刘学亮掩饰不住兴奋。

同样美起来的，还有村庄的“颜值”。改造提升农家别墅园，添置休闲度假木屋，实施坑塘整治、道路硬化绿化、集中供热，铺设自来水管网、污水管网，建设村民活动广场……刘学亮掰着手指头给记者数着村里的变化。“2017年以来，一系列人居环境提升改造工程让我们村彻底变了样，村容整洁了，基础设施齐全了，空气清新了，村里越来越漂亮，来村里休闲旅游的人也多了。”刘学亮自豪地说。

陈志明的家就在村里的荷塘边上，晚饭后，他总喜欢带上孩子出门遛弯，看看村里的好景色。“我原来不爱出门，这荷塘原来就是一个臭水坑，垃圾成堆，蚊蝇成群，村民们都绕着走。这路啊，一下雨，一踩一脚泥！”走在新修的路上，欣赏着荷塘月色，陈志明很是感慨。

不知何时，月亮已悄悄爬上枝头。欢喜庄党群服务中心前的健身广场上，又开始热闹起来，年轻人打着篮球，妇女们扭起了秧歌，老人摇着蒲扇闲聊，孩子们追着闹着，其乐融融。不远处，村里新栽种的合欢树，长得正旺。

本报记者许东远

来回160公里，驱车往返3个小时，这是钱少华家和周家港村的距离。

2018年10月，由武警上海总队政治工作部转业至上海市青浦区纪委监委；2019年6月，任青浦区朱家角镇周家港村驻村指导员……皮肤黝黑、脸上时常挂着笑容的钱少华总是目光如炬。他相信：只有走近群众，了解群众的难处，才能更好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既然到村里抓发展，就必须脚沾泥土、落地生根，多为村里办实事。”钱少华说，“我是来做事的，不是来镀金的。”

“最盼解决的问题、对美丽乡村建设的意见建议、对村‘两委’的意见建议……”拿着自制的《走访村民家庭信息登记表》，来村里没几天的钱少华就开始了挨家挨户的走访。

“我们这里没有公交车，小孩子上学、大人上班都较困难。”村民朱炳君一句话引起了钱少华的注意。第二天，钱少华又去了朱炳君家，这次还叫来了左邻右舍，大家都反映没有公交车，生活上很是不便。

钱少华了解到，周家港村西片区共有201户628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179人，学生45人。大部分老百姓出行主要依靠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车等工具，腿脚不便或不会驾驶出行工具的老人、学生、残障人士只能望“路”兴叹，没有公交成了他们出门就医、走亲访友的“拦路虎”。

说干就干。为了更高效地考察，钱少华买了一辆2000元的二手电动车。8月的上海天气炎热，为了研究公交站点线路设置，钱少华几乎天天骑着“爱车”收集老百姓的意见想法。有一次，由于酷热，他差点中暑。“每次看他办公室里的头盔不见了，我就知道他又去找老百姓了。”周家港村村主任胥雪华说。

终于，钱少华跑出了希望。经过多次调研，他带头起草了《关于周家港村西南片区村小组设置公交站点的调研报告》，并协调村“两委”班子会对报告进行了集体研究并上报镇规保办。一个月后，规保办的同志告诉钱少华，经上级部门协调，预计年底通车。

2020年1月17日，周家港村迎来一件喜事，“朱家角6路”公交车从村里始发，村西片区“不通公交出行难”的窘境成为历史。78岁的高立翠老人是公交车的第一批乘客，坐在干净明亮的车厢里，老人笑了：“我以后能每天去镇上看重孙女了。”

路通了，村里的致富不能落下。钱少华发现，随着土地减量化、规模化种植体量减小、年轻人外出务工较多，特别是没有适应市场发展的村集体经济特色产业，村子前进的“脚步”慢了下来。解决这一难题，“就要引入社会资本，盘活绿色生态村，这样既能输血更能造血”，短短四个月，在钱少华及其同事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乡村研学基地项目落户古钟朱家角，这也是朱家角镇首个纯社会资本市场化运作、独立核算的美丽乡村研学基地项目。随着时间推移，“施工图”正不断向“实景图”转变。

推进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事先沟通协调好的闲置房、林地、菜地流转事宜，没过几天又反悔了。“咱们大家把闲置农房、林地流转出来，不仅能拿到可观租金，还能美化环境。”在钱少华和同事们一次次劝说下，老百姓开始打消顾虑。

项目动工优先使用本村村民，一部分人就业问题得到解决。2019年5月，第一个占地3800平方米的沿江草坪项目由周家港村村民竞标成功，村里20多个农民参与开工，老百姓由开始的观望到现在更积极地参与到项目建设中。

钱少华和同事们也不忘拥抱互联网，把周家港村搬上“云端”，今年5月19日，周家港村委会内一改往日宁静，传出阵阵笑声和喝声，村党总支书记张星球、驻村指导员钱少华正对着镜头推介周家港的乡村旅游联动和农产品。

“把手机变成我们的‘新农机’，把农活变成我们的新农活。”村委会改直播间，村干部变主播，卖力吆喝旅游、特产、美食……“村支书+驻村指导员+旅游公司老总”，三个男人一台戏，从周家港的前世今生聊到深度挖掘自有IP以及未来的乡村振兴之路。一个小时直播，共吸引了16000多名网友点击。网友们纷纷留言：“村干部也直播，厉害了！”“开场还敲鼓，好有乡村风！”

“乡村振兴，既要有颜值，又要有实力。”钱少华希望通过“直播+电商”的模式，促进农产品销售，把周家港村打造成传递党的声音的红村、特色产业发展的旺村、优化业态布局的活村、彰显文化特色的靓村。

选派优秀干部支持本市经济相对薄弱村发展，是上海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的重要举措。上海市委组织部会同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共同印发《关于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选派优秀干部支持本市经济相对薄弱村发展工作的通知》，明确面向全市527个经济相对薄弱村，从市级机关、市属国有企业和各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中，选派优秀干部支持其发展。其中，市、区共同选派200名优秀干部到200个薄弱村任驻村指导员，其余327个薄弱村选派挂村联系员，实现直接联系服务薄弱村全覆盖。

以点带面、心手相牵。一位位指导员像一颗颗种子，在广大农村发芽结果，带领老百姓乘风破浪，向着乡村振兴进发。

脚步到了，百姓心中的烦恼事就少了

『臭酱』品出小康香滋味

东北大酱，因发酵等原因在特定阶段产生一定气味，有人闻不惯称之为“臭酱”，但其口感却十分鲜香。在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芦河镇东升村，每逢清晨唤醒乡亲们的，除去鸡鸣，还有浓郁的酱味。

东升村位于我国大兴安岭南麓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伴随着脱贫攻坚工作进入决战决胜阶段，这个小村子也迎来了小康社会的曙光。

“现在政策好，虽然有一些扶贫产业分红，但村里没有自己的‘生意’！”东升村党支部书记于景林一直惦记村里啥时候能建成自己的产业，带领乡亲们从“吃得饱”转向“富起来”。

“去年底，听说新增项目扶持，我赶忙冲到镇里了解情况。”于景林回忆说，当时省里有笔50万元的投资，可以建个大酱厂，关键是要在2020年元旦前建成投产，且资金半年后才到账。

“就1个月时间，建厂投产，能行吗？”毕竟涉及整个村，于景林心里有些“打鼓”。回村后，他连夜开会。“村委会旁的废弃学校能作为厂点”“用工不愁，村里不少贫困户都在家”……大伙儿的支持和热情让于景林感动。

隔天清晨，他再次来到镇政府放话：“定了，这厂子我们建村。”顶着严寒，村干部到多家酱厂考察，又自掏腰包凑齐建厂经费，召集近20户贫困户，冒着零下20多摄氏度的低温，带着大伙儿正式开工。

2020年元旦，崭新的酱厂内挤满了村民，起锅、烧水、下豆，看着一粒粒黄豆在锅内翻腾，大伙儿冻了一个月的身子，这一刻也都“热”起来了。

4月，于景林又来到县里“投亲访友”，这家赊100多个缸盖，那家赊一批包装箱。“我不怕丢人，只要能顺利产酱，我个人面子算个啥。”他说。

目前，东升村共生产大酱3万斤，已售出近5000斤。务工半年的贫困户李淑琴摇身变为万元户。“这钱啊，还得靠自己亲手挣，花着心里舒坦。”她说。

除去务工，酱厂还带动村民发展庭院经济，免费为100多户村民提供优质豆种，种成后高价回购，预计户均增收700元左右。“以前院子就种点菜，吃不了就扔，今年种两亩黄豆，到秋能卖1000多元呢。”贫困户石兴国说，今年置办年货的钱有了。

于景林介绍，酱厂马上要引进袋装生产线，拓宽销售渠道，来年提产至10万多斤，增收就能覆盖全村了。“最近流行直播带货，我也在学习，争取把大酱卖得更多、更远。”他说。

(徐凯鑫)据新华社哈尔滨电

## 大事小事烦心事，尽管来找“寨管家”

新华社贵阳8月6日电(记者李黔渝)“‘寨管家’服务村寨每一家，大事、小事、烦心事，尽管去找他。”这是贵州湄潭县西河镇石家寨村村民总结的口头禅。为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当地近年来组织乡贤、退役军人等担任村寨“寨管家”。

在湄潭农村，负责操办红白喜事的人被称为“总管”，他们办事有礼有节，受人尊敬。“‘寨管家’能起到类似‘总管’的作用，把管事的人聚起来，把村寨的事管起来。”西河镇党委副书记朱永兵说，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升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和服务群众水平，“寨管家”应运而生。

去年八月底，石家寨村红旗组村民石中进种植的中药树苗被邻居家的牛损坏，他和邻居沟通过几次都不解决问题。红旗组的“寨管家”成员王银了解此事后出面协调，邻居终于同意赔偿400元树苗损失费，并答应会看好自家的牛。“如果没有‘寨管家’来帮忙，我和邻居是谈不拢的，搞不好还要打架扯皮。”石中进说。

这看似农村“鸡毛蒜皮”的纠纷，要真正解决还需“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记者从湄潭县委组织部了解到，“寨管家”采取村党支部引领，将退休返乡人员、退役军人、致富带头人等凝聚起来，并激发护林员、水管员等公益岗位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让每个村民组的管理服务人员由过去1名村民组长增加到多人，管理区域划分更细、责任落实得更实，基层自治力量重心不断下沉。

兴隆镇梁桥村长岗岭寨的一户易地扶贫搬迁户搬到县城安置点住了半年，按照政策规定，老家的房子必须拆除，但他却反悔阻挠，迟迟不让拆房。村里派出“寨管家”成员吴永芳上门耐心做他的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顺利拆了旧房。梁桥村党支部书记唐波说，“寨管家”更熟悉村里的实际情况，往往能找准工作重点，化解难题事半功倍。湄潭县委组织部部长穆泉斌介绍，为提升“寨管家”工作积极性，今年全县按照每个户籍人口不少于9元预算安排“寨管家”服务群众专项经费。

目前，湄潭县共有“寨管家”成员4561名，其中从乡村优秀人才中推选出群众公认、组织认可、自愿服务的寨长976名、管事员3450名。湄潭县还从镇、村党组织分别选派年轻干部到基层一线担任“指导员”和“包保员”，培养了一批乡村人才。



▲8月2日，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飞鸟在水牛身上休息觅食。  
新华社发(蒙钟德摄)

## “朋锅”过晚年，幸福来敲门

新华社呼和浩特电(记者张丽娜、徐壮、任耀耀)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平地泉镇花村互助幸福院，一对正在剪头发的白发苍苍“姐妹花”引起了记者注意。

这对“姐妹花”的年纪加起来快160岁——妹妹傅蓉花76岁，姐姐田学珍80岁。她们不沾亲、不带故，却因选择来到花村互助幸福院而有了“朋锅”的机会。

“朋锅”，当地方言中意为“搭伙过日子”。花村互助幸福院目前入住73户114名老人，许多人老伴去世、儿女在外，幸福院像一个“朋友圈”，让他们在这里找到一起遛弯、唠嗑的晚年伙伴。

2012年，我们整合了新农村建设、农村危房改造和扶贫移民等涉农资金500万元，改造了村里的废弃小学校舍，还新建了11幢平房，免费欢迎65岁以上的老人们前来养老。”平地泉镇党委书记刘亮介绍起花村互助幸福院的历史。

住户张德礼爷爷是幸福院的第一批住户，2012年底，他和另外5户老人从邻近的

大井洼村搬来。

“一开始也有顾虑，不种地了，我们吃什么？”张德礼回忆，“没想到所有政策都能享受上，靠着最低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险，我们两口子每月能收入1000多元。幸福院分的屋子有42平方米，配齐了菜窖、凉房，还有60平方米菜地，比老家的土房条件好多。”

记者在张德礼家看到，几个老人围坐在炕上聊天，门前的菜地长势喜人，朝南的主屋宽敞明亮。卫生间干净现代，抽水马桶、太阳能热水器等设施一应俱全。

“集中居住、分户生活、互相帮助”的模式在当地老人中逐渐口耳相传。察右前旗委书记杨印说，刚开始，老人比较少，等部分老人适应这种养老模式后，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来到这里。

如今，察右前旗已经有了37处幸福院，入住6312名老人。一些幸福院，申请入住的老人甚至要“拿号等位”。

老年人为何能很快适应这种养老模式？刘亮认为，“集中又分户，比较符合老年人的

心理需求，每家的几分自留地，让老人有营生，也能有一份归属感。”

老人们有了归属感，情感的温度也不断提升。张德礼悄悄告诉记者，幸福院里的鳏寡老人，已经有三对重新组合，再结缘分。

2012年，班润虎爷爷的妻子去世，孤单一人的他搬进了幸福院，虽然身体还挺硬朗，但许多事也得拜托院里的其他老人帮忙。

热心的邻居张桂英大妈看在眼里，记挂在心，把同是孤寡老人的“老闺蜜”吕玉花奶奶介绍给了班润虎。两位“一人户”老人惺惺相惜，越聊越熟，一来二去，“朋锅”变成了“一个锅”。“她的手艺不赖。”脸圆圆的班爷爷笑着说：“他能照顾我的糖尿病。”穿着花裙子的吕奶奶笑着。

在花村互助幸福院，活动广场、文化室里坐满了悠闲的老人；洗衣房里，全自动洗衣机、干洗机嗡嗡翻转。为了方便老人就医，镇上把村卫生所也设置在幸福院，乡村医生随时随地给老人们服务。

乌兰察布的一个个幸福院里，“老有所养”的幸福就这样生长。